

盘龙城遗址废弃的年代下限及相关问题

盛 伟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本文通过对比中原地区中商时期的陶器材料,将盘龙城废弃的年代下限推定在中商三期。此外,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与盘龙城关系密切的荆南寺、铜鼓山等遗址废弃的时间,并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盘龙城的废弃与周边地区文化面貌发生变动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本文的讨论或许可为我们研究盘龙城的性质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盘龙城 荆南寺 石门皂市 铜鼓山 废弃年代 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27(2011)03-0065-08

前言

盘龙城遗址是目前已发现的商文化在南方地区最大的一个据点^[1]。关于该遗址废弃的年代下限问题,过去由于对二里岗上层至殷墟时期陶器特征的把握不是很清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存在分歧。比如《盘龙城:一九六三—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盘龙城》)认为遗址废弃的年代在二里岗上层二期偏晚^[2],《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则认为遗址最晚阶段遗存的年代可至中商二期^[3]。

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浠北商城的发现和发掘以来,以浠北花园庄早期的 97G4、97H4、98M9 和晚期的 97H1、97H2、98M6、98T1、98T2 等单位为代表的一大批实物资料的出土^[4],使我们对二里岗上层二期至殷墟一期阶段陶器特征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5]。此外,有学者进一步依据小双桥、藁城台西、浠北商城等遗址的材料提出中商文化的概念,将这一阶段的遗存分为三期,并对各期陶器、铜器的特征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6]。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将盘龙城最晚阶段的遗存与中原地区年代较为明确的器物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推定

盘龙城遗址废弃的年代下限。

以盘龙城为中心,商文化对江汉平原西部、澧水上游流域以及洞庭湖流域等周边地区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7]。本文在探讨盘龙城废弃年代的基础上,还试图进一步分析该遗址周边地区若干遗址点废弃的年代下限,以及盘龙城废弃前后这些遗址点所在区域内文化因素的变动情况,以探讨盘龙城的废弃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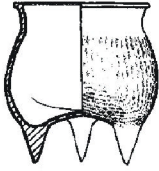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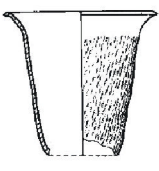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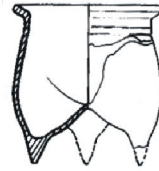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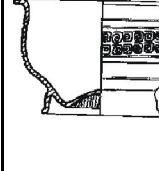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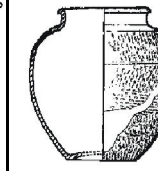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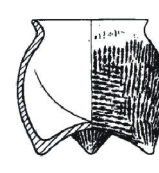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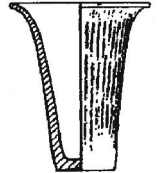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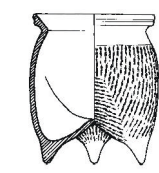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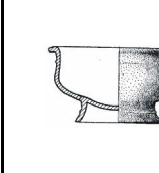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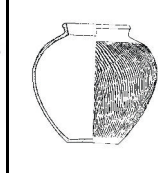
一、盘龙城遗址废弃的年代下限分析

要探讨盘龙城遗址废弃的年代下限,必须找到一批属盘龙城遗址最晚阶段的遗存。考虑到盘龙城遗址是由多个遗址点组成的,而报告中杨家湾遗址属盘龙城最晚一期的遗存较其他遗址点丰富,因此我们以杨家湾遗址作为分析的突破口。

《盘龙城》将杨家湾遗址分为七期,通过重新检视各单位所出器物及地层关系,我们认为报告的分期是基本可信的。同时依据浠北商城以及藁城台西等遗址点的发掘资料建立起的对中商二、三期陶器特征的认识,我们认为杨家湾遗址第七期的部分单位在年代上可能

收稿日期:2011-04-12

作者简介:盛伟(1988-),男,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第一组		第二组		
	鬲	杯	鬲	簋	罐
杨家湾第七期陶器					
	1	2	3	4	5
中商时期陶器					
	6	7	8	9	10

图一 杨家湾第七期陶器与中商时期陶器对比图

1.PYWH5:6 2.PYWH5:1 3.PYWH6:52 4.PYWH6:51 5.PYWH6:41 6.洹北(98H18:12) 7.洹北(97G4:57)
8.洹北(98T1 :79) 9.藁城台西(T11:52) 10.藁城台西(F2:43)

并不都是同时的。比如, PYWH5 所出折沿连裆鬲 PYWH5:6(图一, 1)与洹北商城连裆鬲 98H18:12(图一, 6)相比锥足和裆部较高, 最大腹径处较低, 从中商二、三期陶鬲发展序列上看, PYWH5:6 显然要较洹北商城 98H18:12 早, 后者的年代较为明确为中商三期; 此外, 该单位所出陶杯(《盘龙城》报告称为筒形器) PYWH5:1(图一, 2)唇面外倾, 斜直腹, 与洹北商城所出属中商二期的同类器 97G4:57(图一, 7)类似, 因此 PYWH5 的年代或可定在中商二期。而譬如 PYWH6、PYWM11、PYWT17 等单位, 通过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的对比分析, 可以发现 PYWH6 所出陶鬲 PYWH6:52(图一, 3)裆部较低, 足跟粗矮、内收较甚, 与洹北商城 98T1 :79(图一, 8)以及藁城台西 M86:1^[8]类似。PYWH6:51(图一, 4)以及 PYWM11:12 陶簋卷沿, 腹部较浅, 圈足较矮、稍外撇, 与藁城台西 H42:2 差别很大, 而与藁城台西 T11:52(图一, 9)、M75:1 类似, 因此年代上应较 H42 晚而与 M75 相当; 该单位所出陶罐 PYWH6:41(图一, 5)折沿矮领、鼓肩斜腹等特征与藁城台西 F2:43(图一, 10)类似; PYWT17 所出陶簋 PYWT17 :5 直口、折沿、斜直腹、矮圈足外撇

等特征与 98 洹北 T2 :48 类似。洹北商城 T1、T2 以及藁城台西 F2 的年代均在中商文化第三期, 因此上述几个单位的年代亦大致相当于中商三期。如此, 我们认为杨家湾遗址第七期单位实际上可分为早晚两组, 第一组以 PYWH5 为代表, 年代相当于中商二期; 第二组以 PYWH6、PYWM11、PYWT17 等单位为代表, 年代在整个杨家湾遗址的遗存中是最晚的, 相当于中商三期。

盘龙城第七期的遗存还见于城内的城垣、城壕、宫殿基址以及城外的楼子湾和李家嘴遗址点, 但是除李家嘴遗址点外, 其他遗址点第七期的单位或因出土陶器过于残破, 或因仅出土硬陶、青铜器年代特征变化缓慢的器物, 难以通过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的对比分析以较为精确地推定其年代。至于出土有较多陶器的李家嘴遗址第七期的 PLZH10、PLZH16 等单位, 其所出陶鬲锥足和裆部较高, 最大腹径明显小于器高, 整体年代特征应与属杨家湾第七期第一组的 PYWH5 的陶鬲类似, 年代上亦应大致相当, 故李家嘴第七期单位的年代应相当于中商二期。如此, 前文所述的杨家湾遗址中相当于中商三期的那批单位基本代表了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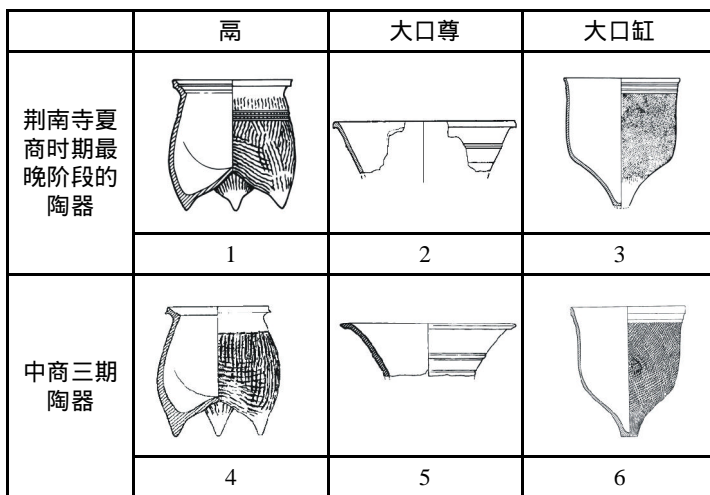
龙城最晚阶段的遗存。

综上所述,由于整个盘龙城遗址中,高等级的贵族墓(PYWM11)以及有特殊功能的祭祀遗迹(PYWH6)均废弃于中商三期,因此该遗址废弃的年代下限可推定在中商三期。

二、盘龙城周边地区若干遗址点中商三期阶段遗存辨析

所谓盘龙城周边地区大致可相当于中商文化“盘龙城类型”包括的区域^[9],其地理范围以盘龙城遗址为中心,西约至江汉平原西部和澧水上游流域,南约至今湖南岳阳地区,东约至今江西九江地区。此外,考虑到九江地区商时期已发现的遗址点数量和已开展过的田野工作及公布的材料都非常有限,而且对于该地区遗存的年代和性质的讨论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不少的争论,故暂不将这一地区的材料纳入本文的讨论。前文已将盘龙城废弃的年代下限推定在中商三期,下文将主要以中商三期作为一个时间节点,通过与中原地区及盘龙城遗址中中商三期阶段的遗存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考察盘龙城周边地区中若干有代表性的遗址点在相当于这一个时期所表现出的一些现象。

江汉平原西部的荆南寺遗址^[10]与盘龙城的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该遗址商时期最晚阶段的遗存。《荆州荆南寺》报告将该遗址夏商时期的遗存分为八期,我们依据报告中公布的部分单位的层位关系及出土遗物对报告中的分期结论进行了检验,发现其基本可信。但是报告中将出土遗物数量极少的T5单位划为最晚的第八期,并依据这些单位中所出釜鼎常见于周梁玉桥遗址,推断该期年代可晚至殷墟二期,我们认为这一结论颇值得商榷。首先,釜鼎之类器物器形简单,年代特征变化较小,而且T5等第八期单位中所出釜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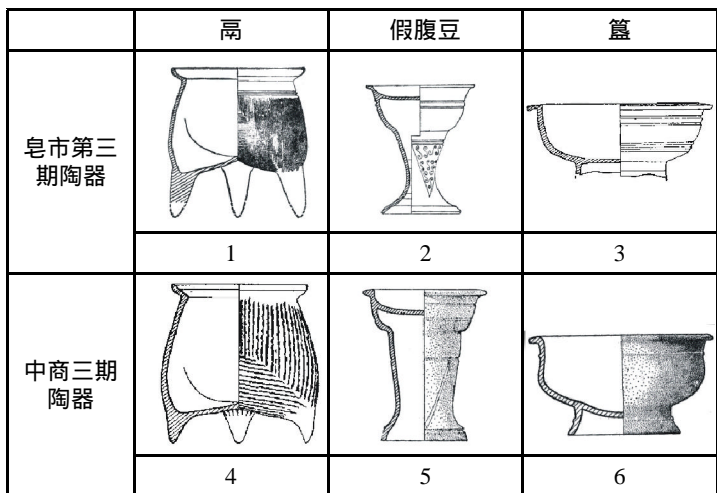


图二 荆南寺最晚阶段遗存与中商三期陶器比较图

1.H10:1 2.H10:7 3.H12:7 4.藁城台西(M86:1)
5.浍北商城(98T1 :4) 6.藁城台西 F14:42

大部分均较为残破,故将其单独作为一期似乎证据不足;其次,根据近年来公布的周梁玉桥遗址新的发掘材料^[11],该遗址遗存的年代并不均属殷墟一、二期,其最早期的遗存至少可至二里岗文化时期。因此报告中仅依据少部分釜鼎以及此类釜鼎在周梁玉桥遗址较常见就将夏商时期遗存的年代定为殷墟二期应有失偏颇,其所分第八期即难以单独划为一期,而且年代也不会晚至殷墟二期。我们认为报告中所分第七期实际上基本代表了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最晚期遗存,属于该期的典型单位有H10和H12。关于这些单位的年代,报告曾依据H10所出陶鬲和H12所出大口尊分别与安阳大司空村SH317:38鬲和藁城台西F6:55大口尊特征相似,推测该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我们通过与中原地区以及盘龙城遗址年代特征较为明确的特征器物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发现荆南寺H10所出陶鬲H10:1(图二,1)裆部较低,足跟低矮且内收,整体形状接近正方形等特征同于藁城台西M86:1鬲(图二,4);H10以及T2 A所出大口尊(图二,2)大敞口、肩部消失等特征亦同于浍北商城98T1:4(图二,5);大口缸T18H12:7(图二,3)直口,口沿下饰多道凸弦纹、腹基内收、平底等特征与

藁城台西 F14 :42(图二,6)类似。浍北商城 98T1、藁城台西 M86、F14 的年代均属中商三期。由于报告所称殷墟一期采用的是邹衡先生关于殷墟文化的分期意见,在相对年代上等同于现在所说的中商三期。因此,荆南寺遗址相当于中商三期的遗存可以 H10、H12 等单位为代表,又因为以上两个单位在整个荆南寺夏商时期遗存中处于最晚阶段,因此,荆南寺遗址废弃的年代可推定在中商三期。



图三 石门皂市遗址第三期陶器与中商三期陶器比较图

1.TB8 :64 2.TB2 :9 3.TB2 :68 4.藁城台西(M26:1)
5.藁城台西(M56:1) 6.藁城台西(T11:52)

澧水上游流域的石门皂市遗址^[12]与盘龙城遗址的关系亦

十分明显。王文建^[13]、何介均^[14]等先生曾对石门皂市遗址进行过较为细致的分期研究。王文建先生认为石门皂市遗址可分为两期 5 组,其中第二期第 4 组以 TB1、TB2、T5、T41 等单位为代表,第 5 组以 H3、H4、T1、T2、T2、T5、T6 等单位为代表,属石门皂市遗址最晚阶段的遗存。何介均先生将石门皂市遗址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以皂市 TA、TB 各探方第 层、T25~T46 第 层为代表,第四期以 T1~T8 第 层为代表。总体上看上述两个分期结论大同小异,考虑到王文建先生工作开展的较早,当时对石门皂市遗址的材料还尚未做全面的整理工作,而且从分期本身来看还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现象(如 T5 既是第 4 组的典型单位,也是第 5 组的典型单位),因此本文采用何介均先生的分期结论。

通过与中原地区中商三期陶器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属第三期单位的 TB8 所出陶鬲 TB8 :64(图三,1)裆部以上折沿、斜腹、裆线较低等特征与藁城台西 M26:1(图三,4)基本类似,考虑到在这一时期南方地区的鬲逐渐经历了一个鼎式化的过程,鬲足足跟相比中原地区要显得瘦长,故 TB8 :64 陶鬲的足足跟相比藁城台西 M26:1 鬲足足跟显得瘦长并不构成

两者年代上有差异的证据,而依据这两件鬲的足部以上基本类似的特征,我们认为两者的年代大致相同,此外, TB2 所出假腹豆 TB2 :9(图三,2)浅盘、盘壁较直、高圈足等特征与藁城台西 M56:1(图三,5)基本类似; TB2 :68 簋(图三,3)卷沿外翻、折腹等特征与藁城台西 T11:52(图三,6)以及盘龙城 PYWH6:51 基本类似。藁城台西 M26、M56、盘龙城 PYWH6 的年代均相当于中商三期,因此我们认为石门皂市遗址第三期的年代可推定在中商三期。

接下来我们再看湖南岳阳地区的铜鼓山遗址^[15]。关于铜鼓山遗址的分期,何介均^[16]、罗仁林^[17]、郭胜斌^[18]、何努^[19]、向桃初^[20]等先生均做过研究。除何努先生外,学者们一般都认为该遗址中 T7H6 的年代最晚,通过重新检视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本文也基本认同这一看法。至于该单位的具体年代,学者们的观点也稍有出入。向桃初先生将 T7H5 与 T7H6 一并划为铜鼓山遗址的最晚段,并主要依据 T7H5:1 陶鬲与郑州小双桥 T190 :23 和荆南寺 T5 A:86 类似推测该段的年代属中商一、二期。通过重新检视这些单位的年代,我们基本认同向先生对 T7H5 年代的认识,但是如果从该书 P42 表一的统计结果来看, T7H5 只出一件 A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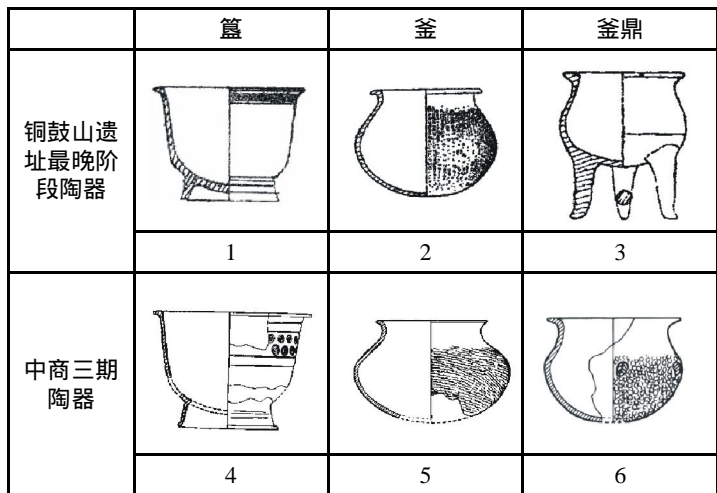
鬲，并不能通过其他器物与T7H6 串联，因此将它们划为一个年代组似乎证据不足。此外，我们通过与中原地区以及盘龙城和荆南寺等遗址中商三期的典型陶器的对比分析，发现T7H6:4 簋(图四,1)深腹圜底、圈足外撇等特征与浍北商城98T2 :48、T1 :18以及盘龙城PYWT17 :5(图四,4)基本相同，T7H6:2 绳纹釜(图四,2)卷沿、鼓腹、整体形状成横长方形与荆南寺H12:2(图四,5)类似，T7H6:3 釜鼎(图四,3)足部以上的特征与荆南寺H12:18(图四,6)基本相同。浍北商城98T2、T1、盘龙城PYWT17、荆南寺H12等单位的年代均属中商三期，因此，我们认为属铜鼓山遗址最晚阶段的T7H6的年代亦可推定在中商三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荆南寺遗址、铜鼓山遗址属中商三期的单位可代表了该遗址的最晚阶段的遗存，因此，荆南寺遗址和铜鼓山遗址废弃的时间与盘龙城遗址废弃的时间基本是同步的，均可推定在中商三期。澧水上游的石门皂市遗址在这一阶段虽尚未废弃，但从所发现的遗存数量上看中商三期开始亦显现逐渐废弃的迹象。

三、盘龙城遗址的废弃与周边地区文化变动的关联性分析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江汉平原西部地区中商三期前后遗存的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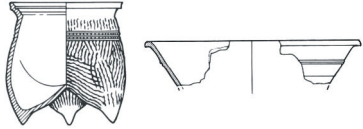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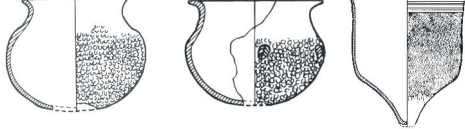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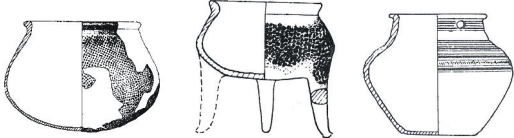
如前文所述，中商三期阶段该地区的遗存以荆南寺遗址的H10、H12两个单位为代表。从文化因素组成的角度上看，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鬲、大口尊等器物为代表。鬲为夹砂灰陶，饰粗绳纹，器形呈方体(图五,1)；大口尊为泥质灰陶，大敞口、无肩(图五,2)这



图四 铜鼓山遗址最晚阶段陶器与中商三期陶器比较图

1.T7H6:4 2.T7H6:2 3.T7H6:3 4.盘龙城(PYWT17 :5)
5.荆南寺(H12:2) 6.荆南寺(H12:18)

一组显然可归为商文化因素的器物，第二组以釜类、大口缸、几何印纹陶等器物为代表。釜多为夹砂灰陶，饰米粒纹或绳纹，形制较为复杂，常见的有球腹(图五,3)和鼓腹(图五,4)两种。大口缸形似郑州地区常见的将军盔，夹砂红褐陶，直口、腹内收、凸平底(图五,5)。几何印纹陶有硬陶、釉陶等。这一类器物在本地区长期存在，有着自身独自的发展序列，大部分器物不见于中原商文化地区，因此可称为非商文化因素。至于该地区稍晚于中商三期的遗存，有学者曾依据这一地区的周梁玉桥、梅槐桥和官堤等遗址出土材料命名了一种“周梁玉桥文化”，并认为周梁玉桥文化的第二期大致相当于邹衡先生所说的殷墟二期^[21]，年代上正好与中商三期相衔接，因此这一批遗存大致可代表荆南寺遗址废弃之后江汉地区西部遗存的面貌。从文化因素上看，它们亦可粗分为两组，第一组以鬲、罍等商文化因素的器物为代表，数量极少。第二组以釜(鼎)、罐、瓶等非商文化因素的器物为代表。釜(鼎)一般为夹砂红褐陶，饰绳纹，卷沿敛口、鼓腹、圜底，鼎足一般较细长，下部为弯曲的圆锥形(图五,6、7)。罐多为泥质红褐陶，饰绳纹和弦纹，矮颈、折肩、斜腹、凹圜底或平底(图五,8)。以我们对

	第一组	第二组
中商三期陶器		
	1 2	3 4 5
稍晚于中商三期的陶器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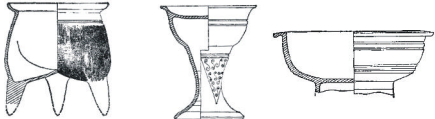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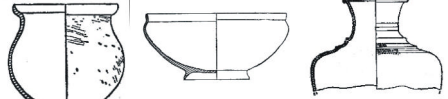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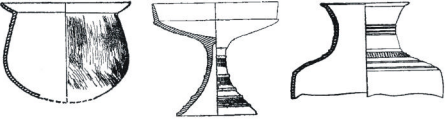
图五 江汉平原西部地区中商三期前后遗存比较

1.H10:1 2.H10:7 3.H10:3 4.H12:18 5.H12:7 6.T3 A:18 7.T3 A:2 8.T2 A:12
(注 :1~5 出自荆南寺遗址 6~8 出自周梁玉桥遗址)

周梁玉桥遗址第一次试掘所获材料的标本统计结果看,这一时期属第一组的器物数量仅有5件,而属第二组的器物数量将近20件,两者比例约1:4。因此,我们认为中商三期之后江汉平原西部地区在荆南寺遗址遭到废弃之后,第一组的商文化因素的器物数量上急剧减少,第二组的非商文化器物逐渐在该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

再来看澧水上游流域的情况。该地区的石门皂市遗址在中商三期阶段并未完全废弃,

从文化因素组成的角度上看,该遗址中商三期阶段的遗存至少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以鬲、簋、假腹豆为代表。鬲为夹砂红褐陶,饰弦纹和绳纹,矮裆、锥足外撇(图六,1);簋为泥质红胎黑皮陶,饰弦纹,卷沿、浅盘、圜底(图六,2);假腹豆为泥质红胎黑皮陶,饰弦纹,有的饰倒三角纹,浅盘、高圈足(图六,3)。这一类器物显然属商文化因素。第二组以釜(鼎)、碗(豆)、罐等器物为代表。釜(鼎)基本为夹砂红褐陶,饰绳纹或素面,形制较为复杂,常见一种为盘口,

	第一组	第二组
中商三期陶器		
	1 2 3	4 5 6
稍晚于中商三期的陶器		
		7 8 9

图六 澧水上游流域中商三期前后遗存比较

1.TB8 :64 2.TB2 :9 3.TB2 :68 4.TB2 :58 5.TB8 :76 6.TB1 :26 7.T5 :61 8.T2 :11
9.T5 :11(注 标本均出自石门皂市遗址)

球腹、圜底(图六 4)。碗(豆)为泥质红胎黑皮陶或灰陶,矮圈足外撇(图六 5);罐为泥质灰陶,长喇叭形颈(图六 6)。这一类器物在澧水上游流域比较常见,延续时间很长,有着自身的发展序列,因此应属本地文化因素。中商三期以后较为典型的遗存可以何介均先生所分的石门皂市第四期单位为代表^[22]。从文化因素上看,这一阶段多以本地区常见的釜、平底瓶、细柄豆等第二组器物为主,之前常见的第一组商文化因素的典型器物已基本不见(图六)。

至于洞庭湖流域,铜鼓山遗址于中商三期遭到废弃,中商三期以后该地区较为典型的遗存我们可以岳阳地区商时期的第五期遗存为代表^[23],较为典型的单位有对门山 H1 和 H7^[24]、易家山 M3^[25]等。关于这一地区中商三期至稍晚的一段时间遗存在文化因素的构成上所经历的变动,罗仁林先生亦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论述^[26]。罗先生认为从第五期开始,过去该地区所常见的以鬲、甗、爵、假腹豆等商文化因素的器物急剧减少,而以釜(鼎)、小口高领罐、花边圈足碗、甗形器、硬陶为代表的明显不属商文化因素的器物陡然增加。本文赞同此观点,具体的分析过程可参看罗仁林先生的论文,在此不再赘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商三期阶段,盘龙城周边地区的荆南寺遗址、铜鼓山遗址均遭到废弃后,这些遗址点所在地区的文化面貌都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尽管这种文化因素的变动表现的形式并不完全相同^[27],但是商文化因素在这些地区急剧退缩实为它们之间所共有的现象。

四、余论

关于盘龙城遗址的性质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解读,但目前仍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通过对盘龙城、荆南寺、铜鼓山等遗址的废弃时间以及盘龙城周边地区的遗存在文化因素上发生变动的讨论,认为大约在中商三期时期,盘龙城遗址的废弃实际上带

动了荆南寺、铜鼓山等遗址的废弃以及此后商文化因素在江汉平原西部、澧水上游流域、洞庭湖流域等地区的急剧退缩。考虑到盘龙城遗址在南方地区的中心地位,因此本文所揭示出的这一现象似乎可为我们解读盘龙城遗址的性质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注释:

[1] 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48页。本文所用盘龙城遗址的材料均来源于此报告。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4页。

[4]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7年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本文所用洹北商城的材料均见于这两份报告。

[5] 本文所指二里岗上层二期、殷墟一期的等概念均采用《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的体系,见注释3。

[6] 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7] a、何努《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分析》《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b、王文建《商时期澧水流域青铜文化的序列和文化因素分析》《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c、罗仁林《岳阳地区商时期的文化序列及其文化因素分析》《考古耕耘录—湖南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集》,岳麓书社,1999年。

[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本文所用藁城台西的材料均见于此报告。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6—269页。

[10] 荆州市博物馆《荆州荆南寺》,文物出版社,2009年。本文所用荆南寺遗址的材料均见于此报告。

[11] 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1987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9期。

[12] a、周世荣《湖南石门皂市发现商殷遗址》《考古》1963年第2期;b、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13] 王文建《商时期澧水流域青铜文化的序列和文化因素分析》《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4] 何介均《湖南商时期古文化研究》《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

[1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与东周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5辑,求索杂志社,1989年。

[16] 同[14]。

[17] 罗仁林《岳阳地区商时期的文化序列及其文化因素分析》《考古耕耘录--湖南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集》,岳麓书社,1999年。

[18] a、郭胜斌《铜鼓山商代遗存文化因素分析》《江汉考古》2001年第4期 b、郭胜斌《商时期洞庭湖东岸青铜文化的年代分期与文化性质》《考古耕耘录--湖南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集》,岳麓书社,1999年。

[19] 何努《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分析》《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20] 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线装书局,2008年,第35-52页。

[21] a、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10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b、王宏《论周梁玉桥文化》,《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

[22] 同[14]。

[23] 同[17]。

[24] 岳阳市文物管理处《岳阳县对门山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湖南考古集刊》第6辑,岳麓书社,1994年。

[25]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等《岳阳县箬口镇易家山商代与东周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7辑,岳麓书社,1996年。

[26] 同[17]。

[27] 从洞庭湖流域的情况来看,该地区在中商三期以后土著文化因素并没有得到增强,而是来自于赣江流域的以甗形器、硬陶等器物为代表的一类文化在这一地区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而譬如江汉平原西部及澧水上游地区则在中商三期之后以釜类器物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因素得到增强。

The Abandoned Time of the Panlongcheng Site and Related Issues

Sheng Wei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Based on a comparison to the pottery materials from Central Plain Area,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anlongcheng Site was abandoned in the third period of Middle Shang (1400 - 1300 BC?).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raises issues about the abandoned time of the Jingnansi Site and Tonggushan Site which had similar cultural elements to Panlongcheng, and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bandoning episode of Panlongcheng and cultural changes occurred during this episode in neighbor areas. The study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cultural features of this site.

Keywords: Panlongcheng, Jingnansi, Zaoshi of Shimen, Tonggushan, abandoned time, cultural factors

(责任编辑、校对:蔡丹)